

# “以小说见才学者”辨正及其小说史叙述意义

## ——兼及“才学小说”的概念使用

温庆新\*

**[摘要]** 《中国小说史略》专篇讨论《野叟曝言》、《镜花缘》、《燕山外史》及《蟬史》四部小说并名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时,并非基于类型归纳或文体判断而言。这些小说依旧被归入“神魔小说”或才子佳人型的“世情小说”中。鲁迅此举实为强调此类小说写作者“自寓”、“寄慨”的创作倾向,突出“以小说见才学者”创作现象于小说史的叙述意义,是其建构“从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的小说史演进规律之目的使然。这些意图及采用列举式的评判模式,导致《史略》并未妥善处理此类小说作者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书写之间的冲突,致使“以小说见才学者”最终偏向析解作者创作意图之一面。学者将“以小说见才学者”曲解为“才学小说”等,并当作重要的小说类型,进一步偏离鲁迅本意。关注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以小说见才学者”创作现象,将比拘囿于“才学小说”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定之举更有意义。

**[关键词]** 《中国小说史略》;“以小说见才学者”;“才学小说”

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针对《野叟曝言》、《镜花缘》、《燕山外史》及《蟬史》等作品提出“以小说见才学者”论断以来,学界逐渐重视对此类作品的研究,冠之以“才学小说”,以为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创作现象,并对此类作品进行小说史意义的叙述,取得了一些共识。然而,学界对“才学小说”概念的使用及界定,并未趋一,仍有许多分歧。因此,辨正鲁迅“以小说见才学者”之说及其小说史叙述意义,重新讨论“才学小说”的概念使用,将有助于相关研究的持续深入。

### 一、误读《史略》:从“以小说见才学者”到“才学小说”

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印的《中国小说史大略》首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专篇<sup>①</sup>,这使《野

\* 文学博士,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410081。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小说资料集解”(11AZD062)的阶段性成果。

①按:鲁迅自1920年12月起于北京大学讲授“小说史”课程,又于1921年1月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等处开讲。《史略》初为授课讲义稿,后经其多次修订,现存最早版本为鲁迅于北大等学校讲课时由北大国文系教授会随课陆续印发的油印讲义稿《小说史大略》。第二种版本为约略1921年下半年至1922年刊发的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本文所引《史略》语均据后者(载《鲁迅研究资料》(第17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3-163页),一般不再一一注明。

叟曝言》等作品得以进入现代小说史的研究视野。作为《史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该书1924年以降的各修订本有关“以小说见才学者”的论断,本质未变。然“以小说见才学者”提法于《史略》则属特例,与其所言“讲史小说”、“神魔小说”、“狂邪小说”等其他小说类型有别,后者主要据古代小说题材类型或表现手法而名类,致后来研究者接受此观点时与鲁迅原意多有偏差。

自“以小说见才学者”提出伊始,研究者就提出不同看法。如明确标注参考过《史略》的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说“清代小说之创作,据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共分为七类。”却径自将《野叟曝言》等称为“才华小说”而非“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直接替代;并言此类小说“不只以表现故事为目的,而以作小说见才学,抒写一种特别思想者,当以《野叟曝言》为先。继之者有《蟬史》,《镜花缘》、《燕山外史》等”<sup>①</sup>,甚至将这四部小说以创作时间先后之时序排列。胡行之虽认可鲁迅的小说类型提法,然又言《镜花缘》“可以称通俗文学中底社会小说”,则非完全信服鲁迅之说。所谓“才华小说”,其所解说并非据小说题材及描写主题,而是从作者炫学角度切入。而1934编写的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却将这些小说归为“才藻小说”,亦是基于写作者创作动机而言<sup>②</sup>。而较早以“才学小说”概念替代者当推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其云:“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把清代小说分为拟晋唐小说,讽刺小说,人情小说,才学小说(原题‘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狭邪小说,侠义小说,清末之谴责小说,并把清人补续前代神魔小说的作品放在前代,那是很精当的。”<sup>③</sup>直接转为“才学小说”的表达。据此,1930年代的研究者虽注意到鲁迅提法,各自却尝试自我诠释,提出异议。这种解读虽有助于转化视角深入研究《野叟曝言》等作品,然已逐渐偏离鲁迅原意。

在“才华小说”、“才藻小说”与“才学小说”三种诠释中,“才学小说”更为现今治小说史者所青睐。系“才学小说”或可从小说题材着手或从作者创作动机考虑,具有更大的诠释操作空间;又因“才学小说”提法与“讲史小说”等表述结构及意指相近,更契合此类作品产生的社会背景(即乾嘉考据兴盛之时),学界遂偏向“才学小说”提法,以为《史略》对古代小说类型的又一重要归纳。近年来,不少研究者进一步将《野叟曝言》等四部小说作为“才学小说”典范,希冀从整体上把握此类小说的发展情形。然将这些小说作为“才学小说”典例、并以此为某一独立小说流派或类型的做法,首先面临以下几大难点:一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作品数量仅此四部,相对较少;且这四部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以《野叟曝言》、《镜花缘》为优,《蟬史》、《燕山外史》为次,难以放在一起整体关照。二是,鲁迅之说被置换为“才学小说”后,该提法似乎可认为既是着眼于小说题材,亦可认为是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考虑,这给后续研究带来诸多困扰,各家评判标准、取舍角度的分歧相对较大——怎样解决《野叟曝言》等作品叙述的实际主题与学界赋予“才学小说”内涵与外延相冲突的情形?如何解释《蟬史》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中国小说史大略》)的存在形态与“作者自寓”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冲突?换言之,“才学小说”作为小说史的功能性叙述意义,如何与具体作品进行协调?三是,这四部作品既有文言小说又有白话小说,作品的存在形体并不一样,所描写的内容亦有天壤之别。所赋予“才学小说”的内涵显然无法涵盖这些作品书写的重要主题。造成此难之由,系学界未对“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提法进行科学论证,更未对“以小说见才学者”向“才学小说”转变进行合理说明而致。

对此,有研究者尝试从《野叟曝言》等四部作品的时代背景入手,借助文化阐释等视角;或从作者的创作意图出发,试图对“才学小说”内涵进行补充论证。典型者如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对“才学小说”所下定义,试图从作者创作意图方面以补鲁迅所说,云:“(才学小说)乃是以小说的形式,罗列、炫耀个人才学的作品。作者的创作本衷是‘露才显能’,亦即‘以撰写小说为手段、工具,试

①胡行之:《中国文学史讲话》,上海:光华书局,1932年,第153-158页。

②赵景深:《中国文学史新编》第三编第十二讲“清代小说”,北京:北新书局,1936年,第320-321页。

③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下册),北京:北新书局,1937年,第365-366页。

图达成其展现、炫耀个人才学的主要目的’。因‘才学小说’以展现作者个人的才学内涵为主,故对于小说艺术的各项要求,虽有时兼顾,但为了炫才则不一定重视、遵行。”<sup>①</sup>但这四部小说均有的共同点则是“自寓”并以自遣为主调,显然这与“露才显能”之论有本质之别。虽学界有诸多补充论证之作,仍无法对上述几点矛盾进行比较充分的圆说。又有研究者据小说的创作主旨批判“才学小说”类名有欠周延,并试图对这四部小说进行重新分类,比如试图将《镜花缘》归为博物体小说<sup>②</sup>,或归为世情小说<sup>③</sup>,或推为言志小说<sup>④</sup>,这些情形就是具体作品的实际书写主题与“才学小说”内涵相冲突的典型。它们均存在这样的弊病:鲁迅只是提过“以小说见才学者”,所谓“才学小说”并非鲁迅本意,而是后世研究者对鲁迅之论的一种解读而已,以“才学小说”为小说类名实是后世治小说史者所为,这就导致相关补充论述不能切中肯綮。

应该说,近今研究者论述“才学小说”时,往往缺乏牢靠的前提基础及科学论证。研究者对“才学小说”提法或补正或非议,主要围绕作者创作意图与“才学小说”定义等方面展开,对鲁迅当初名类“以小说见才学者”初衷的理解则渐行渐远。因而,若欲解决目今学界研究“才学小说”的尴尬态势,势需正本清源,还原鲁迅此说的初衷,彻底跳出“才学小说”从概念到概念的拘囿。

## 二、鲁迅提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前后及其本意

早在《小说史大略》第十二篇《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文末,鲁迅就提及《镜花缘》、《野叟曝言》二书,以为“历史的神异小说”之余绪,“源出英贤小说”<sup>⑤</sup>,此即鲁迅对这两部作品最初的类型归纳。直至《中国小说史大略》,才专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将《蟬史》、《燕山外史》与之罗列,形成四部小说并驾的论述格局。故还原“以小说见才学者”提出缘由,应从鲁迅对《野叟曝言》等作品的熟知情形谈起。

其一,鲁迅对《野叟曝言》等小说不甚熟悉。

应该说,鲁迅对《野叟曝言》并不够熟悉。遍查《鲁迅全集》“日记”部分(1910年—1925年)与“书信”部分(1910年—1927年),未见记载购买、抄录或借阅《野叟曝言》的记录。一般而言,鲁迅抄书、借阅或托买时会有所记录,如1920年11月12日记“午往图书馆访子佩,借《文苑英华》六本”、1920年12月13日记“午后往张闳声寓借《说郛》两本”等等。又,1921年4月16日记“三弟往留黎厂,托买《青箱杂记》一本,《投辖录》一本,共泉五角。”<sup>⑥</sup>亦不曾见书信载向友人寻访《野叟曝言》的记录。(鲁迅曾去信胡适,交流《西游记》等小说的研究意见,并曾托胡代查《红楼梦索隐》作者之名,可资佐证<sup>⑦</sup>)据此,可推测鲁迅并未购买或托人代借过《野叟曝言》。

据《中国小说史大略》所言:“其书光绪初始出,序云康熙时江阴夏氏作,其人‘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屏绝进取,壹意著书’。”所据为光绪八年(1882)西岷山樵序本。然其所言“迨印行

①王琼玲:《清代四大才学小说》,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7页。

②陈文新:《传统小说与小说传统》,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68—280页。

③王永健:《别具一格的世情小说——〈镜花缘〉新论》,《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10年第2期。

④董国炎、蔡之国:《言志小说,还是才学小说?——试论〈野叟曝言〉性质及小说分类细化之得失》,《明清小说研究》2010年第1期。

⑤鲁迅:《小说史大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4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88页。

⑥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93—497页。

⑦按:鲁迅于1922年8月14日《致胡适》、8月22日《致胡适》,这两封信主要记录与胡适交流研究《西游记》之心得;而1923年12月28日《致胡适》曾谈及《史略》之编纂,并言及《三侠五义》、《西游补》、《海上花列传》等小说,信末并云“作《红楼梦索隐》之王沈二人,先生知其名(非字)否?”(《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8—440页。)

时,已有小缺失;一本独全,疑他人补足之。”此观点并非鲁迅所创。早在1907年,黄人《小说小话》就言:“《野叟曝言》作者江阴夏某,(名二铭,著有《种玉堂集》,亦多偏驳。此书原缺数回,未刊,不知何人补全?先后词气多不贯。)文白即其自命,盖析夏字为姓名也。康熙中,当道诸公争尚程朱学说,而排斥陆王。作者曾从某相国讲学,故雅意迎合。书中所谓时太师者,虽若影射彭时,实指某相国也。”<sup>①</sup>而《中国小说史大略》有所谓“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又有时太师,则杨名时也,其崇仰盖承夏宗澜之绪余,然因此遂或误以《野叟曝言》为宗澜作。”据此语可知鲁迅对《野叟曝言》版本及作者自寓之说的判断依据当源于《小说小话》。鲁迅手稿《采录小说史材料书目》列有“《小说小话》蛮在小说林中丁未(光绪)至戊申印行”一条<sup>②</sup>,知《小说小话》为《史略》重要参考书。进一步推测,鲁迅所谓“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之心理”等判断,当亦源于《小说小话》而引申。

《中国小说史大略》相关论述,罕有征引《野叟曝言》原文,所据主要是《江阴艺文志》与西岷山樵之序、《凡例》及《小说小话》,泛泛而论,并无过多研究,势必无法深论此书精髓。《野叟曝言》主要写作者夏敬渠借文素臣以抒发身肩天下之重的不凡抱负,诚如此书《凡例》所言:“是书之叙事、说理、谈经、论史、教孝、劝忠、运筹、决策,艺之兵、诗、医、算,情之喜、怒、哀、惧,讲道学、辟邪说、措春态,纵谐试,无一不臻顶壁一层。至文法之设想、布局、映伏、钩绾,犹其余事,为古今说部所不能仿佛。”<sup>③</sup>应该说,《野叟曝言》对彼时社会各方面及各地风土人情的描写是全方位的,甚至包含印度等海外习俗;不仅含有经史内容,兼及医算兵书,范围广泛。这里虽含有作者炫才之一面,但小说描写内容的广泛、主题意指的多样及描写手法的精湛,显非炫才一语所能涵盖的。因而,有研究者根植于此书文本描写而对其主题书写进行诸如人情小说、博物体小说的重新划分,是有一定道理的。换句话说,《中国小说史大略》提出“度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之初,其主要据作者创作意图而发,而非作品文本本身。即鲁迅所言伊始,并未处理好作品实际描写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关系。其所谓“炫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等语,则倾向于描述作者的创作意图。要之,不论是鲁迅翻阅《野叟曝言》的时间条件,还是对成书及具体论断的判定情形,均表明鲁迅对《野叟曝言》不够熟稔。

鲁迅对《燕山外史》、《蟬史》等作品,也缺乏深入了解。早在《小说史大略》时,这两部小说尚未进入鲁迅视野,或可推知其当时对这两部小说价值并不肯定。查鲁迅“日记”、“书信集”及“书帐”等资料,亦不见鲁迅购买这两部小说的记录。同时,《鲁迅日记》多载其去图书馆查书之事,如1918年3月1日记“下午往通俗图书馆”<sup>④</sup>,亦未曾提及此书。鲁迅真正注意这两部小说当始于编纂《中国小说史大略》。其时,鲁迅于《野叟曝言》、《镜花缘》中形成的意见已大体成型,《蟬史》、《燕山外史》刚好符合此类而被归入。这与鲁迅无时间细读文本、以致编纂时所用材料皆为曾看过或熟稔者之情形亦有很大关系<sup>⑤</sup>。另据《中国小说史大略》相关论述,可知鲁迅对《蟬史》、《燕山外史》不熟悉的程度。比如,《燕山外史》首先因“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的叙述手法而被注意,其次才是“略以寄慨”的作者意图。但贯穿《燕山外史》一书的中心议题则是“情”,陈球曾说其书为“枯肠搜句,总缘我辈钟情”。吕清泰《序》亦言:“《燕山外史》传窈生逸事,始由钟情,继至割情,终于忘情。”“情”成为《燕山外史》塑造人物、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窈生与爱姑聚散就是在“情”的笼盖下进行的——有情之人如爱姑,必为节妇;无情之人如“前大妇”,必遭批斗。然《燕山外史》的书写主题不为鲁迅注意,其所引文为

①黄人:《小说小话》,《小说林》1907年第6辑。

②刘运峰:《鲁迅全集补遗》,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92页。

③夏敬渠:《野叟曝言》,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3页。

④鲁迅:《鲁迅全集》(第15卷),第304、320页。

⑤温庆新:《如何客观对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从欧阳健先生〈中国小说史略批判〉谈起》,《内江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燕山外史》(第二卷)有关爱姑与窦生分别之“辞”,关注重点仍在“排偶之文”上。而鲁迅认为《蟬史》是“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的代表,这对以西方文艺理论为评判准绳的《史略》来说,评价不可谓不高。但《中国小说史大略》又说“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也。《蟬史》亦然,惟以其文体为他人所未试,足称独步而已。”对《蟬史》主题有所贬低,所肯定的只是“他人所未试”的叙述“文体”。据此,鲁迅对《燕山外史》、《蟬史》思想价值均不持肯定态度,重点关注这两部小说以才藻见长及其创作形式的特殊。相比“度学问文章之具”的《野叟曝言》与“博识多通而敢于为小说”的《镜花缘》而言,这种评价意见要差得多。

在这四部小说中,鲁迅最为熟悉的当属《镜花缘》。早在《小说史大略》之《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篇末,鲁迅就推为清代“英贤神异之作”典型。到《中国小说史大略》,据鲁迅自注“详见新标点本《镜花缘》卷首胡适《引论》”,知鲁迅曾读过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镜花缘》(1923年)。但据研究,《中国小说史大略》与《镜花缘》有关的绝大部分论断并非鲁迅自我发明,而是钞自胡适《〈镜花缘〉引论》——鲁迅从《镜花缘》产生的背景考察其产生的缘由,认为李汝珍“不得志”、“作小说以自遣”而“敢于变古”等判断,对《镜花缘》思想内涵、时代价值及艺术手段的分析等等,这些论断大多是对《〈镜花缘〉引论》相关论断的吸收或借用<sup>①</sup>。这种情形说明鲁迅虽曾读过《镜花缘》,然亦无太多心得,反而对同行胡适的观点更为信服,故其对《镜花缘》文本的熟知程度是可存疑的。鲁迅对“以小说见才学者”最为重要的代表作《镜花缘》所采取的论述方式及其断语,尚且有些随意,几无自家见解。(鲁迅专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的初衷或有受启于胡适之一面)要之,“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所列举的四部作品,鲁迅均不算太熟悉。

其二,鲁迅对“以小说见才学者”的阐述。

既然《中国小说史大略》有关《野叟曝言》、《镜花缘》等的研究意见多转述、援引他处,以作为一种“述学”性质的讲义稿存在。那么,据此而列的“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如何组织框架、展开论述呢?

因鲁迅对这四部小说的文本不太熟悉,故所论重点并非对作品文本的分析,而侧重于作者创作意图方面。如其除论述《野叟曝言》“度学问文章之具”等特点外,主要关注此书“自寓”倾向,云:“作者‘抱负不凡,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比之‘野老无事,曝日清淡。’(凡例云)可知衍学寄慨,实其主因,圣而尊荣,则为抱负。”又说“文白或云即作者自寓,析‘夏’字作之”。而“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的《蟬史》,被贯以“虽华艳而乏天趣,徒奇崛而无深意”的基本论调,其所探讨重点亦是屠绅自寓之论,云:“书中有桑蠋生,盖作者自寓,其言有云,‘予,甲子生也’与绅生年正同。”论及《燕山外史》时,亦云:“其本成于嘉庆中,专主词华,略以寄慨。”论《镜花缘》时,更为直白:“(作者)顾不得志,盖以诸生终老海州,晚年穷愁,则作小说以自遣,历十余年始成”;“盖惟精声韵之学而仍敢于变古,乃能居学者之列,博识多通而仍敢于为小说也;惟于小说又复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己,则博识多通又害之”。由此,这四部小说共存的作者自寓的创作倾向成为鲁迅论述的主体。在鲁迅看来,“以小说见才学者”是这四部作品唯一的共同点。因而,虽然鲁迅未曾对“以小说见才学者”进行正面且直接的概念及内涵阐释,亦不见从产生背景、文化孕育及后续影响等方面进行述说,但据其分析归纳可知着眼于作者“自寓”倾向是鲁迅对“以小说见才学者”内涵的主要表达。作者“自寓”行为会在一定程度上含有炫才成分,这或可切“以小说见才学者”语。然作者自寓的情感投射更多是导向寄慨之一面,这点鲁迅是深有感触的。因为相关论述着重关注“炫学寄慨”、“略以寄慨”、“作小说以自遣”等方面。据此看来,鲁迅当初名类时,篇目命名之意与对作品的实际分析并不完全一致,多有偏差。这点鲁迅或许有所察觉,其论

<sup>①</sup>温庆新:《鲁迅所编〈明以来小说年表〉与〈中国小说史略〉之修订》,《明清小说研究》2013年第2期。

述这四部小说的情感倾向总体上以鄙薄为主,针对这四部小说的思想内涵而论;且蜻蜓点水,不作深入探讨,以作折中之意。如评《蟬史》为“徒奇崛而无深意”、批《镜花缘》“博识多通又害之”。可见,鲁迅论述时并未妥善处理作者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书写主题之间的冲突,而以分析作者创作意图为主,则这四部小说“自寓”的表现方式是被归纳分析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此篇论述的主要目的非欲行对这四部作品进行小说类型的圈定。在《小说史大略》时,《野叟曝言》就被定为“源出于英贤小说”,云:“并非虚构人物,寄其理想。”《中国小说史大略》则说:“与明人之神魔及佳人才子小说面目似异,根柢实同,惟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而已。”据所言“面目似异,根柢实同”可知,自《小说史大略》至《中国小说史大略》,《野叟曝言》一直被当作“神魔小说”之余绪;对此书的类型归纳,本质并不变。《中国小说史大略》论《蟬史》时亦云:“《蟬史》神态,仿佛甚奇,然探其本根,则实未离于神魔小说;其缀以褒语,固由作者稟性,而一面亦尚承明代‘世情书’之流风。”论《燕山外史》亦说:“其事殊庸陋,如一切佳人才子小说常套,而作者奋然有取,则殆缘转折尚多,足以示行文手腕而已。”《中国小说史大略》虽未曾对《镜花缘》进行明确类型归纳,但《小说史大略》第十二篇《明之历史的神异小说》篇末就已将其推为“英贤神异之作”的典型,并言:“虽多据《山海经》,实亦《西游》之一叶也。”以作神异小说之流。《中国小说史大略》依旧与《野叟曝言》放在一起论述,表明鲁迅对此书的类型归纳并不曾改变。据此,《中国小说史大略》对这四部作品的类型归纳多靠向“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型的“世情小说”,此为鲁迅对这四部作品所作的类型归纳。惟因这四部作品或“以异端易魔,以圣人易才子”,或“神态仿佛甚奇”,或“行文手腕”足示,创作手法与形式有别于一般“神魔小说”与“才子佳人小说”,且均含有作者“自寓”、“寄慨”的创作倾向,而被专篇讨论。可见,此篇主要评判这四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或心态,并非着眼于小说类型的文体判断。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小说史大略》专篇论述时并非采取以时间为顺序的进化论评判模式,而是列举式的评判模式。即首先将《野叟曝言》当作“度学问文章之具”、《蟬史》概括为“欲于小说见其才藻之美者”、《燕山外史》概况为“以排偶之文试为小说者”、《镜花缘》概况为“博识多通而敢于为小说”,然后分别对这四部小说展开论述,并不直接涉及“以小说见才学者”的论述主题,亦不对篇目内涵进行深度论述。在《中国小说史大略》全部篇目中,这种列举式评判模式极为罕见。纵观古代小说的演进过程,展露出才华与学问者并非《野叟曝言》、《蟬史》、《燕山外史》、《镜花缘》四部而已,“才子佳人小说”、“剪灯系列”、《红楼梦》等作品亦为此中代表。在《中国小说史大略》有限篇幅里,若采用进化论评断模式以搜罗殆尽,显然不太可能。因此,鲁迅采用列举式的论断模式,对或炫才、或寄慨、或展辞藻等小说分别各举示例以论说。这种行文模式大可不必照顾通篇的整体与个体之间的协调问题。而有研究者认为“才学小说”起于《野叟曝言》、继之以《蟬史》等小说的论断,则进一步曲解鲁迅本意。然而正是这种批评模式,加重了鲁迅论述过程中未妥善处理这四部小说的作者创作意图与作品实际书写之间的矛盾程度,使其偏向分析作者创作意图之一面。这使得“以小说见才学者”一语,在作者意图与作品书写之间来回摇摆,难以界定。这种缺憾是导致后世研究者将“以小说见才学者”曲解为“才藻小说”、“才华小说”与“才学小说”等的主要原因。

### 三、“以小说见才学者”的小说史叙述意义及“才学小说”的概念使用

应该说,鲁迅提出“以小说见才学者”,实为强调此类小说的史料与文献价值,以突出“自寓”创作倾向的小说史叙述意义。《中国小说史大略》开篇即言:“以小说为度学问文章之具,与寓惩劝同意而异用”,论《野叟曝言》更明确为:“意既夸诞,文复无味,殊不足以称艺文,但欲知当时所谓‘理学家’

之心理,则于中颇可考见。”知鲁迅非议《野叟曝言》为“非文艺”,仅以资料目之。1935年撰《寻开心》又称:“这一部书是道学先生的悖慢淫毒心理的结晶。”<sup>①</sup>这些意见是对《中国小说史大略》的强化。而论《蟬史》时,引该书文本开篇“海隅之行,若有所得,辄就见闻传闻之异辞,汇为一篇”语,关注重点亦是此书汇编性质的材料。换句话说,鲁迅系对清代中叶出现的通过写小说炫学这种创作倾向的注意,把它们当作研究社会背景的资料加以对待;其仅仅将“以小说见才学者”当做小说史演进过程中出现的新现象,即撰写动机的特殊性与创作手法的新鲜味,予以突出。

众所周知,古代小说(主要是通俗小说)衍变至明末清初,经历了集纂的“世代累积型”至文人独立创作的衍变势态,即如署名施耐庵或罗贯中的《水浒传》,其广为流传前亦经过长时间的世代积淀,在诸多“小本水浒故事”的基础上,方经写定者加工润色并定稿;然“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所体现的内涵与才情,并非写定者所独有。清代才进入文人独立创作小说的普遍化阶段,尤其是文人创作通俗小说现象突出。而文人创作的小说中普遍具有炫才、寄慨及“自寓”的倾向。因此,将这种现象冠之“以才学见长者”,对其中较为明显的作品予以列举式探讨,当是鲁迅从小说史叙述意义方面专篇讨论的初衷。古代小说创作往往需要有才学,文人化的作品创作大都具备这样的特征,此即“以小说见才学者”语的最主要内涵。

同时,突出“以小说见才学者”的小说史叙述意义,实为鲁迅进一步强化“从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sup>②</sup>的古代小说演进规律的必然结果。基于整部《史略》而言,鲁迅认为魏晋志人与志怪小说尚处于“无意为小说”阶段,唐传奇属“有意为之”,然属文言小说创作的自觉之始;明清时,章回小说创作的高潮,标志通俗小说创作自觉阶段的到来。然鲁迅亦意识到世代累积型的通俗小说并不能十分有效显现小说自觉的特征,文人的独立创作才是“有意为之”的典型。从古之各类文体衍变的一般规律看,一种文体的孕育、发展、成熟过程即是创作主体由“罕为”到“少为”、再到“勤为”,并且这种文体逐渐成为创作主体寄慨寓才之载体的衍变过程,亦是此类文体之功用呈现阶段化衍变的重要表现。清代康、乾时期集中出现的一批具有“以才学见长”特征的小说作品,这些小说创作主体的创作心态已进入以小说寄寓作者才情慨思的特定阶段。因而,清代文人独立创作的小说作品所体现的思想化与知识化倾向,是古代小说演进过程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在鲁迅看来,“以才学见小说者”即是作者创作意图的突显,这种创作倾向是文人“有意为小说”的典型。据此,鲁迅专列“清之以小说见才学者”篇,最终目的是为强化“从无意为小说向有意为小说演进”的规律。从这个角度讲,“以小说见才学者”的表述,惟有且仅有小说史叙述意义,并不具备文体判断意义。近今学者将鲁迅之意曲解为“才学小说”,转向类型指称,实际上已倾向于使用“才学小说”的文体学意义。

然而,“才学小说”是否可作一单独类名,进行补充论证,使其具备文体学意义的存在依据与使用价值呢?我们知道,“才学小说”一词最初是对鲁迅“以小说见才学者”一语的曲解而致,并不具备牢靠的前提基础。早期使用“才学小说”的学者,并未深入进行过科学的内涵论证;直至当下,“才学小说”一词及其类名内涵的使用仍停留在约定俗成甚至望文生义的阶段。虽有学者尝试对其进行定义,但这种定义主要局限于对《中国小说史大略》进行强化或补充说明,不曾对由“以小说见才学者”到“才学小说”之用语的替代过程进行可行性论证,因而无法规避徘徊于作品的实际描写主题与作者创作意图之间的尴尬,亦有碍于当今学界将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分而待之的论述格局。而据上述,“才学小说”一词无法准确描述《野叟曝言》等小说的本质特征。因而,若欲继续使用已广传的“才学小说”一词、并把它当做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予以突出的话,就必须从小说作品的实际出发,而不是

<sup>①</sup>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第279页。

<sup>②</sup>欧阳健:《〈中国小说史略〉批判》,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80-88页。

拘囿于从概念到概念的圈定,而应进行从作品实情到归纳概括的推演。合理的做法是将文人创作的带有作者“自寓”创作倾向的所有小说作品放在一起综合讨论,如“才子佳人小说”、“剪灯系列”、《红楼梦》等小说。虽说“才子佳人小说”被当作一种重要的小说类型,但除开作品的题材书写,其于作者“自寓”的创作倾向上,与《野叟曝言》等小说并无本质区别。这样,可归入“才学小说”范围下的作品就比较多,这就有助于深入言说“才学小说”一词的内涵及外延,从而在“才学小说”内部区分不同的书写题材,使之趋于合理而科学,其在古代小说演变史上方可真正占据一角。而另一种办法,则是摒弃“才学小说”作为小说类型的使用,而对含有“以才学见长”趋向的小说进行创作(或流传)时间、描写主题等方面的界定,将符合此范围的小说予以集中讨论。如王进驹《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从“以才学见长”的“自况性”特征着手<sup>①</sup>,将对象限定为乾隆时期的长篇小说,这就将论题集中,不失为一良举。但这种做法的最大局限则是不能对讨论对象的全部主题作深入分析、不能明确此类小说的特殊性,亦无法从小说史的高度对此类小说的价值以合理定位。要之,“才学小说”的类名缺乏严密的逻辑依据与科学论证,不具备太高的文体价值;但将“以小说见才学者”作为古代小说演变史上出现的一种特殊的创作现象予以关注,从作品的实际情形入手,对其进行探讨还是很有价值的。

(责任编辑:陆 林)

## Reviewing Lu Xun's Concept of "Showing *Caixue* Through Fiction Writing" and Its Significance for Constructing Chinese Fiction History: With a View on How to Apply the Concept of *Caixue* Novels

WEN Qing-xin

**Abstract:** In his *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中国小说史略, Lu Xun 鲁迅 devotes a special chapter to these four novels: *Yesou puyan* 野叟曝言, *Jinghua yuan* 镜花缘, *Yanshan waishi* 燕山外史, and *Yinshi* 蟬史, and identifies them as novels "showing *caixue* 才学 [academic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through fiction writing". Although this identification is not based on generic and stylistic criteria and those novels are still classified into the types of *Shenmo* 神魔 novels and *Shiqing* 世情 novels respectively, what Lu Xun really wants to do here is to highlight the commonality in the creative motivation shared by their authors who manage to get their own aspirations and feelings expressed between the lines in their novels; and is to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novels for constructing a history of Chinese fiction. This is the direct result from his construction of the law governing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fiction: "novels, which were started as a by-product of literary creation, become one of the professional literary pursuits." There is, however, some tension between the rationale behind and the exemplification for Lu Xun's identification of novels "showing *caixue* through fiction writing", which is inevitably skewed towards focusing on the novelists' writing intentions. Researchers misunderstood Lu Xun's concept of "showing *caixue* through fiction writing" merely as "*caixue* novels".

**Key words:** *Zhongguo xiaoshuo shilue*; showing *caixue* through fiction writing; *caixue* novels

<sup>①</sup>王进驹:《乾隆时期自况性长篇小说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